

# 叶自成——中国传统 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sup>\*</sup>

叶自成 陆昕

【中图分类号】D8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2-0065-06

陆昕(以下简称“陆”):您曾说自己是比较典型的四川人,那么您心目中典型的四川人具有哪些性格特质?

叶自成(以下简称“叶”):四川人考虑问题比较宏观、灵活、务实,不喜欢拐弯抹角,不爱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字眼。所以,四川人给人的印象总是直来直去。邓小平就是典型的四川人,他善于宏观思考,看准了就去,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我的家乡引以为豪的就是出了吴玉章,他带头在四川荣县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

陆:19岁您高中毕业时赶上知青下乡运动,但当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加上您是工人出身,与之前的几批知青相比,条件是不是相对好些?

叶: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要下乡,我当然也不例外。高中毕业后我就在家乡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插队,干了一年农活后,又做了两年农村的小学老师。当时年纪轻,思想比较单纯,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压力。所以,这段生活对我来说是酸、甜、苦、辣俱全,让我难以忘怀,但并没有对我的人生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今天,艰难的日子早已远去,剩下的全是一些很浪漫的回忆:到农民家品尝他们自己腌制的泡菜,月光下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去看电影,与附近的高中同学聚在一起听广播里的音乐、读诗歌。当时,我们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些小诗,也很有激情。一些描述知识青年理想的诗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非常浪漫,或者说带有“玫瑰色彩”。当然,一想到自己将来的前途,心里也会有些迷茫。

陆:您的插队岁月似乎是浪漫之中夹杂着迷茫,多少也反映出您是个乐观主义者,或许是因为您的经历相对比较平顺的缘故?

叶:我性格上比较乐观,主要来自我母亲的遗传,当然也跟我所处的环境有关。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尖子生,一直当班长,在同学中也有些威信,学校的生活确实很顺利。我的性格比较灵活、多变、自信,思想上没什么框框限制。我身上理想、自由的东西比较多,这跟我的价值取向有关。我觉得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变化的,因此我对任何问题都不感到那么悲

观,事情总是有出路的。即使遇到不顺的情况,也是应该积极寻找原因,而且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此路不通大可再寻他途。

在我看来,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选择不同导致结果不同。1977年“文化大革命”后首次恢复高考,大家仓促应试,结果很多学习不错的同学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部分人就选择去工作了。我那年考得不太好,刚刚过了录取分数线,可以去相对差些的学校,但我放弃了。我相信自己还可以考得更好。很幸运,1978年高考中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尤其历史考试成绩得了高分,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了。这一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把握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的命运和成败,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而改变的。

后来,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我也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面临某些情况时也有多种选择。例如,人们现在常说国际环境对国家成长的重要性,这当然不错。但是,看看国际社会许多成功国家的例子,其实有不少是在不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国际环境充满了变数,而国内也有许多影响因素特别是领导人的作为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但都是可以努力解决的。我对问题从不特别悲观,也不盲目乐观,从不认为有什么是必然会好或者必然会坏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总的来看,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这个社会是在进步、发展的。

陆:从您的研究领域看,您是一个研究兴趣比较广泛的人。而您的研究经历也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

<sup>\*</sup>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的侧重点。

叶: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大变革、大转型,我们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变化。个人的变化既由时代变革的客观大环境所决定,也有自己的思考与选择。在社会大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总是有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一个问题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就自然会发现它跟其他问题也有联系,就自然促使我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

我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时学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因此,1992年以前我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也写了一些理论性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当时受列宁论合作制问题的启发,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述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没关系,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私有制,只要它是合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搞好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它的发展动力和机制问题。

陆:1992年您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出版了您的第一本书《叶利钦——俄罗斯第一任总统》,这应该是您研究经历中的一个分水岭,由此之后您更多地关注苏联东欧研究。

叶:学习国际共运,自然要了解苏联、东欧,很自然就进入这个领域。另外,当时我所在的这个系正在经历转型,当时的情况是国际共运专业招生面临困难,于是就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轨道,我们就决定转到外交方向。苏联东欧研究本身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转型后我就更加侧重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这一问题。

我学术上的第一次转型确实也跟自己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亲历的苏联的改革有关。当时叶利钦还是一个反对派,我亲身参加过他的一些竞选活动。直觉告诉我以后会是俄罗斯政坛上的重要角色。在1993年出版的那本中,我觉得对叶利钦这个人还是看得比较准确的,把握了他的性格,也由此得出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的结论。在我看来,他本身没有那种能力——“打破了一个旧时代,但却难以真正开创一个新时代。他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接点上的历史人物”。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领导人的性格关系密切,观察中国的情况也要关注毛泽东、邓小平这些领导人的性格。

陆: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的研究目光从苏联东欧研究逐渐转向中国自身?

叶: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因为过去的经历,我对俄罗斯、中俄关系自然会多一些关注。到今天,虽然我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了中国外交,但仍然关注中俄关系、俄罗斯问题等。2003年出版的《中国大战略》一书中也有对这方面的分析。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在自己有关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后来局势的发展的。在1991年春天写的一篇内部报告中,我指出苏联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如果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能采取正确的政策,还是有可

能扭转局势的,相反,如果继续犯错误,就会使反对派得势。后来,我曾经写过不少关于俄罗斯局势发展的分析报告。在1999年底的一个会议上,当时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叶利钦之后将是普里马科夫上台,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认为普京的可能性更大,不久这一观点就得到了印证。

从重点研究俄罗斯转向中国外交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的改革涉及这方面,其中教育改革就直接涉及我们的工作。苏东剧变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束。继续研究传统的国际共运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1995年、1996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发展为国际关系学院,并设立了外交学系和外交学、中国外交的专业和方向。由于工作需要,外交学研究的重点就是中国外交。其二,从事了10多年的俄罗斯研究后,我认为,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跟踪和分析时势上。这不是高校教师的长处和优势,因为本身有大量的教学工作,在资料的分析和掌握上也没有什么优势,还是应当多吃一些基础性、理论性、战略性研究为好。

转入外交学的研究后,我曾经写过《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和《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地接触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西方的历史并不长,却能产生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西方从古希腊的历史中演绎出许多基本的概念,而中国这样一个有丰富历史的国家却不能用中国的历史来解释西方的理论?尤其是写作《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时,我感到很多问题只关注西方的解释不行。比如,当时一般学者都认为,地缘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可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与西方的地缘思想不同的相关论述。这就是我最初的中国视角。直至今日,我研究春秋战国的外交思想、大战略,都是要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中国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不研究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说透中国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都是与我对国内问题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从国内角度来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外交。任何的国内问题都与国际问题相关联,中国的最大威胁根本不是外部的美国因素,而是中国国内的自身问题。通过重新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我发现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中,西方的强大只是一个外部次要原因,而国内体制不健全、内部的组织力量不强才是主要原因。

陆:您是否有理论流派上的归属感?如果有的话,是始终未变还是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叶: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可能总结出纯粹的客观规律,每种探讨都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见解。任何一种理论绝对化以后都会有缺陷。所以,探讨一种综合各门学派的完美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是,吸收各派的长处有必要,也有可能。分别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按照米尔斯海默演绎的结

果,中美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即所谓大国的悲剧。但是他忽视了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会给中美关系的前景增添很多不确定性。另外,并非不管中国怎样做,美国都一定会有同一种反应,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点。我不刻意避免使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关键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比如,如果把国家利益界定为只是要绝对地压倒对方,那就太狭隘了。所以,我很难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一定要归于什么流派,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理想的、乐观的、现实的现实主义者。我承认国家利益的基本作用,也肯定人类社会、人性、理性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实际上,从方法论上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者,一种是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教条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基本特点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主观唯心主义,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只要是一个大国,命中注定了肯定与别的大国发生冲突,这就是从本本、条条出发的现实主义;另一种是现实的现实主义者,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现实主义者。

可以这样讲,以前做苏联东欧研究时,我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比较深,由此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就是俄罗斯与北约必然对抗。但是事实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一种解释是俄罗斯没有能力对抗,所以只能让步;另一种解释是北约东扩本身给俄罗斯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非人们预料中的那么大,可能其中还有很多积极因素。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消极的方面,认为北约与俄罗斯一定水火不容。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俄罗斯接受了北约东扩的事实,北约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俄罗斯给予了关切和理解。应该说,我也是在实践中认识到有必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陆:对春秋战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是您的关注点之一,您应该是较早系统地考察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国际关系学者。请谈谈您最初切入这个领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叶: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春秋战国的外交思想进行研究。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看西方的历史,但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西方的很多例子说服力不够。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而忽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呢?说到对西方历史的了解,我们肯定比不过西方人。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人要有中国的视角。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做中国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之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困难很多。几年前我写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一书,却发现很难出版。学历史的人不太懂外交,他们担心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春秋战国(视它们为独立国家)会有政治问题。学外交的人不太懂历史,担心误读中国历史。所以,当时中国的历史、外交两个领域的专家都不太认同这本书。出版社则有经济收益上的担忧。实际上这本书在内地被“枪毙”掉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

将其拿到香港出版的原因。

其实,与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是“独立国家”。春秋战国是一个国际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多种体系的第一个体系,即华夏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国家”一开始并不是独立的,但后来演化成了“独立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权力,有各自的活动范围,互相承认,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所谓的周天子只是一个符号,春秋末期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战国时期更是形同虚设。

陆:那么您觉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国际体系是否可以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量齐观?

叶:这两个体系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平等为基础,虽然各国实际上并不平等;而华夏体系中的国家名义上并不完全平等,有等级制,但实际上既有不平等的关系,也有平等的关系,比较复杂。在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很多盟约就基本可以相当于今天的国际法准则。应该说,春秋时期的许多盟约就已经有了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春秋时期形成的华夏体系有点像今天的联合国体系。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体系,成熟得比较早。由于中国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人们就忘记或者忽略了那段历史。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应该是由“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两段不同的部分组成。在西方外交思想传到中国之前,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也在独立地成长,中国也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外交思想的体系。现在之所以处处以西方的规则作为标准,是因为近代西方打败了中国。换句话说,如果1840年失败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那今天中国自己的外交思想体系还是主流。这跟国家的命运相关。所以,中国人其实应该去研究一下《管子》《春秋左传》《韩非子》《国语》等,这些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史,我认为它们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丰富得多,宏观得多。

陆:有些学者认为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处在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理论化程度不高,对此您是否同意?如果同意,您认为应该如何将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的外交思想进行理论化和提炼?

叶:我当时的研究初衷就是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解读中国的历史,缺陷自然就是显得有些生硬。之所以借鉴西方的概念,因为相对来说它们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在接受西方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这套体系来研究中国的那段历史,就容易找到二者的交集和可以相互比较之处。在我看来,一方面要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的垄断,一方面又只能借用西方的这些概念,其实二者并无矛盾之处。所谓打破垄断,是指不要把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作为一套定论来看,因为中国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但如果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于不用,研究起来就会面临很多困难。而且,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很多概念是具有

普适性的,比如“国家利益”一样可以应用到对春秋战国的分析之中。当然,这样做肯定还不够。因为中国的历史跟西方的历史不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概念来概括中国自己的历史。坦率地讲,目前我完成的还只是一些初步工作,我认为自己思考的深度还远不够,对那段历史的解读还有些表面化,对那一时期文献的理解还是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

陆: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中谈到了要从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当代国际关系实践3个角度探讨中国视野。这是否反映了您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希望自己未来的研究落实到“中国视野”这样一个点上?

叶:我以前是不自觉地,而现在是比较自觉地这样做。1997年左右我关注中国春秋战国外交思想时的出发点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应该有一些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或者说自己的特色,但我当时并没有设想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中国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东亚体系跟欧洲体系也是两种不同类型。比如,美国的一个学者通过研究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来分析东亚体系与西方体系的不同。他的结论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邻国强大到使得一国没法与之竞争,它会选择联合其他国家一起与之对抗。但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越南联合其他国家来对付中国的情况。这说明东亚体系中的国家不管是被中国的力量慑服,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体系本身都能产生一种力量让体系内部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比较小。再有,有些韩国的学者也反对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东亚文化,他们反对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其实,韩国的角度、欧洲的角度与中国的角度都不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来就应该多样化。中国今天的情况是自觉不自觉地就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且不说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同样处在中国国内,中原文化跟我们四川文化就很不同。目前,中国史学的主流都是用中原的文化去演绎中国的历史,但是,参观完“三星堆”之后,你就会发现四川文化与中原文化特色迥异。

陆:您是否认为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外交哲学?这样的外交传统会对中国的现实外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叶:朝贡体系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外交哲学,它是一种带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国际体系。一方面,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周边国家应该服从于中国,这体现了不平等,是现在应当摒弃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用不平等来换取它们的实际利益。如果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不会轻易就使用武力,而是会想方设法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诸如领导地位等“软实力”之后,提供给它们各种实际利益。中国的外交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有关。历

史上,中国在东亚地区长期没有对手,久而久之就形成这样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最强,理应帮助那些臣服于自己的国家,而非从实际利益的目的去思考。“中国威胁论”就是从西方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而产生的一种误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同时,周边国家也有机会一同发展。中国过去强大时就是这样,中国的发展推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它们从中国得到了很多实际利益。中国最近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共同发展等理念,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的一种发扬。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对朝贡体系的研究还不透,尤其是周边国家对此的看法我们了解得太少。我们总是觉得中国的朝贡体系给它们带来了经济上的优惠(政治上的不平等没有争议),但是,在政治上对这些国家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有一位韩国学者提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韩国需要中国皇帝的承认:从文明的角度看,他不认为韩国向中国称臣是屈辱的表现,恰恰相反,通过中国皇帝的册封,韩国承认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学习中国文化,他认为这是韩国作为一个先进、文明国家的表现。对朝贡体系,我们还停留在表象认识的层面,我们总喜欢替自己辩护,没有真正深入研究朝贡体系都包含哪些内容,存在哪些问题。

陆:您曾经专门讨论过国家的“外交心态”,您觉得现阶段影响中国外交心态的是何因素?它对中国外交到底意味着什么?

叶:中国这种大国有两种外交心态:一种是历史上形成的认为自己最强,周边国家都应该臣服于自己的自信甚至自大的心态;另一种,中国在最强盛的时代非常自信、开放。比如唐朝,佛教在唐朝有很大的发展,并没因其外来而加以排斥,反而使佛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中国春秋战国本来也有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华夏文明把这些通通同化了。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同化性特别强。

中国人现在常有的一种心态是对自己的国力没有信心,觉得问题太多,很自卑。近代历史造成中国人对西方国家有一种恐惧感,或者不信任感。所以面对应该“就事论事”的问题,很多人还是一味地回忆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受伤的心态。比如,一谈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联系到帝国主义侵华。所以,中国要逐渐恢复到一种比较正常的外交心态。首先,应该正确看待自己的国力,过分自信、自卑都不对。其次,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有关。比如,毛主席时代中国的心态是一种大国应当自立自强的心态。所以,国家间实力对比方面也有个如何比较和看待的问题,也跟外交心态有关。从某种角度上讲,国家领导人的心态就是国家的心态,或者说它会塑造一个国家的心态。美国现在总觉得自己“力大无比”,这是小布什一派人的心态上升成了一种国家精神。另外,老百姓的心态跟领导人的心态之间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不同的领导人,其自身的能力、魅力不同,不同时期老百姓的整体素质也不同。

前一段时间在对日问题上就体现了一种官方与老百姓之间的互动。所以,老百姓的心态,或者说大部分国人的心态以及影响老百姓的精英的心态,这些都对中国的外交心态的形成产生影响。

陆:您如何评价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有没有哪些方面是您认为应该引起学界普遍重视或者警示的?

叶:我认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之理解、消化。更多的学者应该把眼光放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加深、推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更高层是用中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比较大,似乎一个学者不讲西方理论就显得没有水平,不涉及西方理论的博士论文就没有理论价值。大家都在试图将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理论结合,但是真正做得好的并不多。另外,就学术刊物来讲,学术规范性毫无疑问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的思想自由。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篇文章少了外文注释就显得不成立和不够学术性,很多时候形式变得比内容更重要了。所以,如何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思考。我们这个领域,真正学者自己的新观点还是很少,更多的是一般性论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跟我们的研究范式是不是有关系呢?我没有结论。

陆:有些学者认为所探讨的中国特色是否在宏观层次具有普适性是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难点所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西方的理论强在它的解释力和抽象思维方面。西方的理论跟中国的文化应该有一个沟通,二者不能都自说自话。首先,所谓特殊性本来就是普遍性的组成部分。我们探讨的中国特色是否有普适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难点。其实,这主要在于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够大。西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适性,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发达,它的理念也就容易被认同。我们做研究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问题。现在我们讲的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其实是中国本土生长的,并非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才有,而是通过对中国的传统本身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的结论,或者说中西方得出的结论是有共通性的。区别在于各自背后的文化支撑不同。其次,普适性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都是作为某些个体的特殊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才成为普适性的。中西文化里面都有这样一些方面,可能现在我们不认同,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它就会具有普适性。比如,以前只有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

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是否带有普适性呢?当然,目前中国仍在发展之中,所提供的经验还不够多。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提供的经验自然就少。只有等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经济发展比较平衡、互相支撑,而且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这个模式才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因此就不能说它带有普适性。所以,我认为“北京共识”夸大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带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共性,这种共性可能比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共性更大。

陆:那么您个人认为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关键在哪些方面?

叶:举个例子,什么是中国的国际体系?这需要具体的研究工作。朝贡体系只是中国国际体系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中国比较弱小的时候,中国如何处理同周边比较强大的部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和亲、羁縻,这都属于处理国际体系里面的问题的不同方法。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做深入、扎实的研究。但是这样做的人很少。因为在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个领域不是主流,主流还是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很多时候相关研究的立项都很困难。学术界应该用更宽容的眼光看待新的研究视野。

另外,并非只有讨论春秋战国或者唐宋才是中国特色,从中国人今天的视角来观察国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我现在所做的地缘政治研究就是用中国的历史解读西方的理论。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海权、空权,但我认为中国的发展还是要立足于陆权的发展。陆权既是继承西方理论的陆权,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甚至创新这个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都是从称霸世界的角度解读空间这个概念,它们谈到陆权更多的是指一种称霸世界的眼光。而我是从中国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陆地空间发展的领域。从中国今天的眼光、发展学的角度与从军事战略、称霸世界的角度相比,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陆权概念。这是一个从中国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演绎西方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自己认为是一种创新,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些人口主要是在陆地空间生存和发展。海权、空权都是为了这13亿人口能够更安全、更好地在陆地空间生存和发展而提供的一种辅助的能力。首先需要解决的自然是陆地空间的问题,所以陆权观念是第一位的和最基本的。现在很多学者一谈到地缘政治,就一味地讲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要控制海洋、天空,这些都是西方的思维。这套思维从军事上讲有道理。但是,我试图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重新演绎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从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权力”这个概念即影响力来理解与从发展的角度即人类首先要生存、发展来理解是两个不一样的角度,但它们不矛盾,只有把陆权这个人类的第一生存、发展空间做好了,其他方面才更有可能发展。

所谓的中国视角,不是一定要去研究春秋战国,从现实问

题出发,也可能提出跟西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中国威胁论”的较多,中国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多是从一种政策宣示来讲,并没有从学术上说清楚;再比如,中国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也都是全新的概念,是中国的特色,如果成功就会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和概念。

陆:在读书过程中,有没有几本让您受益良多或者印象深刻的书?

叶:一本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本书我接触得比较晚,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的视野宏阔,向读者展现了很多发展模式,并且专门提到领导人的选择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汤因比在书中比较推崇中国模式,这也是促使我去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本书是《老子》,他的很多思想看来是消极的,但实际上他的抱负是很大的,比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和“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他看似很平淡的对人生、自然的理解里面其实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无为”、“静”、“常”的心态看似消极,但却可能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其实,对待学术研究也应如此,自己的研究得到社会认同当然好,但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很高的价值取向,这样心态也就能更平和一些。

陆:请您谈一下对“学者”这个词的理解。

叶: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见解。切不要在自己没想好的时候就对很多问题妄加评论。与此同时,有些观点即使发表出来会使自己受到一定的压力,也要坚持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学者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是对一些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批评性的研究,不要随波逐流。这是中国比较缺乏的一种人文精神。很多人把与官方保持一致作为一个标准,但实际上混淆了学者和宣传工作者、学者与官员的界限。学者应该坚持不说违心的话,这并非有意去挑战什么,只是意识到某个问题就应该把它讲出来以供大家参考。每个人都有一些新的贡献,学术界就能够繁荣发展,不要讲来讲去大家都是在说同一句话。

陆: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您如何看待与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外交领域,您认为学者会影响政治家吗?

叶:在我的理解中,政治有两种:一种政治就是官方讲的话;还有一种政治是大政治,即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以什么来服务于国家。官方政治与大政治之间有些时候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也有矛盾。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学者就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了。所以,这两者之间要找一个结合点,这涉及标准的问题和自己的立场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外交与官方政治联系密切,我也解读中国的官方外交,但是解读的结果未必与官方完全相同。比如说对多极化,

我就持批判态度。我认为自己的解读也是从国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角度出发的。我否定多极化不是为了反对官方,而是希望中国外交能够更主动,站得更高,能够摆脱多极化的一些局限性。我觉得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否定。在一定程度内,我觉得学术还是存在一定的自由空间的。比如和平发展,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学者应该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学者有学者的思路,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思路,二者是不同的。我只能说,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些是矛盾的,有些是一致的。

另外,我们在实际中已经看到了学者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官方外交政策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中间体现了学者们的贡献。科索沃战争中,中国的一些做法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比如,以什么为制定中国国际政策的出发点,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等。但是,中国学术界与官方部门之间没有这种机制性的联系,二者有脱节的情况,有时甚至相互排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当然,学者的思想、观点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不是学术界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学者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采访者后记:“俄罗斯东欧政治”、“对外开放与中国现代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由这一张叶自成的曾授课程列表,可以观察到他个人的研究之路;与此同时,它也折射出了时代与社会的转变。他是第一个较为深入地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学者,借用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的历史。对于《中国春秋战国外交思想》一书,他坦言“既是探路之作,那就难免粗糙”。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知识的宝藏,早期发掘者的慧眼与勇气总是让人钦佩与难忘。他从发展的角度阐释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试图用中国的历史重新演绎西方的理论;总结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经验,尝试从学理上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提出的原则与理念。在许多人看来,在创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个宏大的工程中,他正脚踏实地地尽自己的一份力。他自认为是典型的四川人,乐观、灵活是自己性格中最大的优点:事在人为,思维角度的转换就意味着海阔天空。正如他自己所言,相对平顺的人生经历和内敛且向往浪漫的个性,使得他尤其欣赏老子“大象无形”的巧喻以及“无为”、“静”、“常”的心态,也更享受一个人的远足与思考。他最中意一位长者送给自己的4个字——“不枝不求”,这其中隐含着他的名字,也表达了他的心声与追求。

[收稿日期:2005-02-26]

[修回日期:2005-12-26]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